



储新宇/著

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与 中国的策略选择

·····
——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 LIN UNIVERSITY PRESS

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

储新宇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 / 储新宇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5601—8700—6

I. ①区… II. ①储…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1482 号

书 名：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
作 者：储新宇 著

责任编辑：李国宏 责任校对：安斌

封面设计：刘 瑜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2012 年 8 月 第 1 版

印张：12 字数：160 千字

201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01—8700—6

定价：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序 言

二战后，多种类型的区域一体化在不同层面的共同利益诉求下纷纷启动。尽管这些一体化初期大多以追求共同安全利益为主，但随着预期利益的实现、信任的增加、合作的深入，共同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即从安全领域逐渐外溢到经济、社会等层面。冷战的终结，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能量的释放，为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致使区域化成为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时代潮流之一。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区域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从历史的视角看，区域化进程一直在曲折中前进。

现实的成功、美好的未来与历史进程的曲折意味着对区域合作经验的总结和秩序的归纳显得尤为重要。欧盟、东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共同利益诉求的驱动下，在一定的条件支撑下，通过一定的合作路径，相应的区域合作秩序就一定能够建构起来。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区域合作将会更深入、更全面、更持久，但国际社会相对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会改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区域化浪潮中，为何合作、如何合作仍然是区域合作秩序建构的两大基本变量。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由于国家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多样性，由于现实社会中发展着的区域化进程的复杂性、多样性，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只要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了合作，相应的秩序就会水到渠成，只不过有高有低、有宽有窄、有深有浅罢了。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正在区域化

和全球化浪潮中全面搏击。但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国家利益诉求和辐射主要集中在亚太区域的事实意味着中国能够而且应该在区域合作和区域秩序的建构上有所作为。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积极参与；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动创制；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积极谋划；对东盟 10+1、10+3 和东盟地区论坛的积极推动；对机制化的亚欧会议，中非、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发展合作论坛的积极参与等，说明中国正在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的构建中积极作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区域合作和区域秩序建构的积极参与将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和国际秩序向更深入、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力量储备和经验支持，从而逐渐为国际秩序的内容提供更多的合理主张。“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就是其中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安全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安全关系中的合作性、共同性和全面性愈发明显。在这种态势下，中国政府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安全观”。中国最先考虑新型安全问题开始于1996在上海创立的“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尽管“新安全观”源于区域合作舞台，但它体现的精神却具有世界意义。在1999年以前，这一理念的影响还局限在双边关系和区域多边关系中。到了1999年3月，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大会这一全球多边场合正式阐述了“新安全观”的世界意义。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此后，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和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把新安全观的内容正式表述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总是一定关系的产物。一般来说，国家只有同其他行为体或国际体系互动时，才会产生安全问题。倘若国家间不存在任何互动，也就无所谓安全或不安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都是相对其他行为体或国际体系而言，总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但受国家实力、制度属性、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会有不同的安全观和安全策略选择。一般而言，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国家可以通过斗争、妥协、合作等三种方式实现其安全目标。就斗争方式而言，一般又有两种可能：单枪匹马式和结盟式。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更多地表现为后者。但结盟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好处是提供了保护，弊端则是发出了挑衅。即前者是指可以从结盟中得到保护，后者是指结盟会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对抗行动或组建对抗同盟。所以，同盟安全并不能完全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安全困境往往会使各国担心它们会在需要同盟时被盟友抛弃，或者由于受到盟友行动的牵连而去履行与它们自身安全关系不大的义务。^① 至于妥协方式通常指的是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往往向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国家寻求妥协。其最终的结果要么是宣布中立并得到威胁国的承认，要么倒向威胁国形成不平等的结盟关系。对于通过寻找盟友形成均势获得安全和通过妥协获得安全的方式，斯蒂芬·沃尔特将其概括为“平衡政策”和“见风使舵”。关于合作安全方式，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国家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来实现国家的安全。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述安全模式的新安全观。其实质是超越了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由于这种新安全观是对以单边主义、结盟和妥协为特征的旧式安全观的超越，适应了全球化条件下安全内涵的扩大和寻求安全手段多样化的趋势，适应了“安全必须

^①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575页。

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的潮流，所以，它有利于彻底消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有利于在和平、互利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国家安全需求。有鉴于此，胡锦涛在外事活动中就积极倡导：“我们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

如果说“新安全观”是中国在安全领域向世界提出的战略主张，那么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意义则是全方位的。

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理念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要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的选择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做出的一种自觉选择。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根据历史规律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所以，江泽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由上千个民族组成的近 200 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可以说，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世界”。

系统工程——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内容。众所周知，建设“和谐世界”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国际社会每一个行为体、特别是各个国家的携手努力。具体表现为：必须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和谐共处、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必须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必须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上述五个层面相互配合、相互依赖，我们所建设的未来世界才是和谐的。

原则支撑——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保障。如上所述，建设“和谐世界”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包括诸多内容的系统工程，这就意味着建设“和谐世界”需要诸多方面的机制来支撑。具体表现为：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各国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该在平

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各国应该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各国应该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各国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各国应该努力在国内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各国应该在国内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各国应该改变对自然界肆意开发和掠夺的发展方式；各国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等。

中国的、世界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意义。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这一战略主张，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和促合作的坚强决心和远大抱负。同时，这一战略主张将有助于尊重各国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有助于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启示未来。本著作者以二战后启动的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为分析对象，研究了

区域秩序构建的动因、条件和路径，解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了中国如何更好和更有效地参与、推动区域合作和创建区域秩序。既有历史维度的经验分析，又有现实维度的策略考量。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现实为关照可以谋发展。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对未来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提供一些借鉴和反思。尽管未来是瞬息万变的，但我相信一些基础性或原理性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是为序。



2012年2月于中央党校掠燕湖畔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论 | 1 |
| 第一节 本书选题 | 1 |
| 一、本书的主旨和意义 | 1 |
| 二、研究方法 | 5 |
| 三、特点与创新 | 7 |
| 四、结构安排 | 9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和理论预置 | 10 |
| 一、概念界定 | 10 |
| 二、理论预置 | 19 |
| | |
| 第二章 区域秩序建构的动因和条件分析 | 33 |
| 第一节 区域秩序建构的动因分析 | 34 |
| 一、国家的社会性 | 35 |
| 二、解决问题（迎接挑战）的需要（准备） | 36 |
| 三、中小国家参与、制衡的需要 | 41 |
| 四、相对大国参与全球博弈和寻找信心的需要 | 46 |
| 五、成功区域合作组织的示范作用 | 48 |
| 六、市场力量的无形驱动 | 50 |
| 第二节 区域秩序建构的条件分析 | 52 |
| 一、合作议题的确认 | 52 |
| 二、均势结构的保障 | 54 |

| | |
|-------------------------------|-----------|
| 三、共同或相似价值观的培养 | 56 |
| 四、互信原则的建立 | 62 |
| 五、合法性的强调 | 67 |
| 六、利益总量的增加和利益分配的合理 | 71 |
| 第三节 区域秩序建构中的不利因素 | 73 |
| 一、安全困境和经济同构 | 73 |
| 二、历史和现实中的恩怨与冲突 | 74 |
| 三、本区域以外国家的参与或干预 | 75 |
| 四、“搭便车”行为 | 77 |
| | |
| 第三章 区域秩序建构的路径分析 | 79 |
| 第一节 国家作为——核心国家的推动和边缘国家的响应 .. | 79 |
| 一、核心国家的积极推进 | 79 |
| 二、边缘国家的积极响应 | 82 |
| 第二节 功能互补——政治安全与经贸合作相互促进 | 83 |
| 一、在冷战期间，功能互补以政治安全合作为主 | 83 |
| 二、冷战后时代，功能互补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 | 85 |
| 第三节 组织搭建——组织机构的创设和组织程序的建构 .. | 86 |
| 一、区域组织机构的创设 | 87 |
| 二、区域组织程序的建构 | 88 |
| 第四节 对外交往——稳定的大国关系 | 89 |
| 一、区域化进程的开放性 | 89 |
| 二、以对美关系为例 | 90 |
| 第五节 机制保障——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 92 |
| 一、国内、国际的秩序保障机制 | 92 |
| 二、区域秩序的保障机制 | 93 |

| | |
|---|-----------|
| 第四章 国家利益诉求范围下的中国地位身份分析 | 94 |
| 第一节 实力决定地位身份 | |
| ——快速崛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 … | 96 |
| 一、纵向比较——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政治文明在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扩大 | 97 |
| 二、横向比较——快速崛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 99 |
| 三、国情基础上的国力——发展中大国 | 102 |
| 第二节 亚太区域——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诉求区和辐射区 104 | |
| 一、中国的经济利益需求主要集中在亚太区域 | 104 |
| 二、中国的安全利益需求主要集中在周边区域 | 105 |
| 第五章 中国参与区域秩序建构的策略选择 108 | |
| 第一节 新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意义 109 | |
| 一、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历史回顾 | 110 |
| 二、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现实意义 | 112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区域秩序建构的策略选择 115 | |
| 一、谨慎和灵活运用中国的综合国力（硬权力） | 115 |
| 二、在软权力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 125 |
| 三、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137 |
| 四、努力实现互利和共赢 | 142 |
| 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 144 |
| 六、推进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利益共存 | 145 |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理论意义上的区域秩序建构和现实意义上的中国策略选择。这两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具体说就是：区域秩序建构的动因、条件、路径分析都是来自于历史上发展和现实中存在的区域化组织的经验归纳，而中国的策略选择就是在这些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利条件的张扬和不利条件的克服来为中国参与和创设区域合作秩序提供一些对策性建议。

第一节 本书选题

本节主要从本书的主旨和意义、研究方法、特点和创新以及结构安排等四个方面来对本书的选题进行简要介绍。

一、本书的主旨和意义

众所周知，追求持久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和促进相互合作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心愿，而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使得这些美好心愿一直在曲折中实现。但睿智的人类并未因此而停止求索，相反，现实的曲折和心愿的美好产生的落差却驱使其迸发出巨大的能力和智慧。作为人类社会中知识含量最高的群体——学者，则更为积极。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各自研究领域和诸多层面作出了不同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其中与本书主旨相关的一种代表性解释是曹泳鑫教授的观点。他认为，通过三个层次的秩序建构可以实现对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制约。即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关系）

秩序，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地区秩序和以国际组织和世界性机构的治理机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① 可见，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层面的选择最可行和符合现实。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给予了较充分的说明。他说，能够包容并理解国际政治全部现实体系的描述、说明、预测、规范和对策，并且具有始终如一的自我修正能力的知识体系尚未问世，而最可行的研究策略是首先建设与各种分析相关的中层命题之岛，然后才能将其联系成一般理论。因为“我们的世界划分为一个个区域，各个国家在这些区域内处理各自的问题和冲突，同时形成各自的权力框架。流行的全球化概念抢在了现实的前头。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程才具有全球性意义。相反，相当多的进程则呈现着区域的延伸这一特点。”^②

与此同时，通过对区域秩序的建构可以逐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建构。尽管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政治集团的政策取向往往是内向的，它会阻碍全球化的发展。比如罗伯特·吉尔平说：“目前存在的巨大危险是，更加地区化的世界经济将由一些相对繁荣的‘岛屿’组成，这些岛屿处于全球贫困和各国疏远的波涛起伏的海洋中。”^③；但本书认为：区域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一种合作的、互利的和开放的区域主义，而且全球化进程不能不跨越区域化这座桥梁。其实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比如说，欧盟有着全球最高水平的地区间贸易，但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原则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在发展一系列合作原则、在进一步推动全球自由化的进程中起着先锋作用。相反，全球主义的深入发展，也会加速区域主义的发展，如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欧盟

^① 参见曹泳鑫：《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②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晏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文版序，第11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迅速获得发展。^①此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开放式区域主义的代表，它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非歧视、自由贸易、透明度、协商与协商一致原则）保持一致。所以，“区域化和区域主义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持续的现实回应和对应力量，恰恰通过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推动‘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等‘世界秩序价值观’，而成为通向世界新秩序的一条途径。”^②这种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区域合作秩序在全球治理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故有学者说：“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球治理的框架似乎是由一个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也就是区域主义的几大中心构成的复杂结构。”“由区域政治范畴中的治理可以构成全球治理的整体。”^③“从长远来看，这种区域的共同治理有利于全球治理，理由很简单，在十几个区域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治理体系，要比在目前 189 个会员国基础上建立一种治理体系容易得多。”^④

一定区域内国家对本区域内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关注并不会影响其对全球整体利益的关注。“对整体的爱，决不会因对局部的爱而消失。……对社会小细胞的依恋，对我们所属的小团体的爱，正是爱国家、爱社会的起点。”^⑤前驻日大使王毅撰文就二者在经济层面上的联系进行了充分解释，他说，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是全球化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最重要的外在形态之一。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经济一体化，但由于受民族国家单个利益的制约，一体化进程必然十分漫长。所以经济全球化进程突出展现

^①参见〔美〕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金帆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2—263 页。

^②见郑先武：《区域研究的新路径：“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载《国际观察》2004 年第 4 期。

^③〔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1 页。

^④参见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2 页。

^⑤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 页。

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画面，除了各国间经济联系的普遍加强外，更为醒目和鲜活的则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区域化。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区域化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许多国家把区域合作作为参与全球化的第一步。^① 尽管这句话所指局限在经济层面，实际上，在其他层面二者的关系亦是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在主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积极地参与、推动乃至创建各种区域合作秩序。很显然，无论是参与全球化还是区域化，都属于多边主义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从之前的革命性的体制外和游离性国家转变成为明显的体系内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性国家。^②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坚持和促进多边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

2005年9月，胡锦涛在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召开的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维护安理会权威、加强集体安全机制》的讲话中说，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安理会权威，才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2010年11月，胡锦涛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说，中国一向倡导、支持并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坚持多边主义和促进多边主义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而且符合中国的和平、开放和合作发展战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坚持和促进多边主义呢？很显然，这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多层次、多渠道的共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国对所在的各层次区域一体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亚太大国，中国正在积极地参与、推动和创设各种层次的区域合作。但与发达的大国相比，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还相对比较短，中国在参与、推动和创设区域合作（组织）方面还缺少经

^① 参见王毅：《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化进程——试论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联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